

推进对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途径的认识*

——马克思提出的重要命题的启示

李玉君

【提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提出一个重要命题：“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在民族间的接触中，文化同化比军事征服本质上更强大。这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仅适用于印度历史和西方历史，也适用于中国历史。中国历史是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民族关系史贯穿始终，多民族统一和融合是必然的历史趋势。各民族间虽然也有过摩擦和战争，更多、更主要的则是友好和交流，最终形成了今天56个民族交错杂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现状。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一直起着向心力和精神纽带的作用。战争和友好相处使得民族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中原文化则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前进方向，在不同层面上促进了多民族的统一和融合。深入理解马克思的论断有助于推进我们对民族融合的认识：军事征服是暂时的和表面的，客观上对民族融合也有积极作用；文化的影响才是长远的和深层的，决定着民族融合的趋势和走向。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军事征服 文化认同 民族融合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提出一个重要命题：“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①。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暴力论》中也有着相似的论断：“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高度一致地揭示了一个普遍的历史规律：较先进的文明与较落后的文明交锋时，最后总是较先进的文明取得胜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进步的保证。先进的文明意味着更充裕的物质财富和更高品质的文化生活，因而对落后民族具有无法抵御的吸引力，促使他们主动或被动地向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学习，最终影响和改变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直至发生民族融合。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11CFX011)、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批准号:W2011052)的阶段性成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6页。

一、马克思命题的重要意义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写于1853年7月22日,载于同年8月8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在这篇通讯里,马克思主要提出了对处于不列颠征服和统治下的印度的相关问题的看法,并预言了印度社会的发展前景。

马克思认为,被不列颠征服之前的印度是一个“不仅存在着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的对立的国家”,是一个“建立在所有成员之间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排他思想所造成的均势上面的社会”。这样的印度社会注定要一次又一次被入侵者征服。在不列颠人之前就有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相继侵入并统治过印度。这些入侵者虽然武力强大,但自身文明程度却低于印度,其统治结果只能是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全都被印度化了。无论入侵者的军队多么强大,靠暴力维持的征服只是暂时的和表面的,只能迫使印度民众被动地接受其统治;与此同时,入侵者却被比自身文明先进的印度文明所吸引,主动或不自觉地被同化。这充分说明相比军事征服,先进文明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更加强大,对落后、野蛮民族的同化势不可挡。尽管着墨不多,但马克思所持的观点却是立场坚定,论断有力。因为马克思要预言不列颠对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所以他更多谈的是不列颠的征服对印度社会的影响。不列颠统治的结果与之前的入侵者的统治结果完全相反,这恰恰是同一历史规律正反两面的表现形式。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而结果不是一如既往地被印度同化,而是同化印度。这是前述“永恒的历史规律”的进一步验证。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确实是善于辩证地分析历史问题的典范。他在肯定不列颠的征服最终会推动印度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批判了军事征服的破坏作用,认为印度文明在被征服的前提下取得的进步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不列颠对印度的影响包含两个方面:先破坏,再重建,也就是在“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的同时“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不列颠人首先是用高于印度的文明“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而对于重建印度所需要的“更加牢固和更加扩大的政治统一”,不列颠人用刀剑来实现,靠电报和军队来巩固。不列颠人对印度的征服和统治,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掩盖不住他们对殖民地残酷掠夺和剥削的本性:“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一到殖民地它就毫不掩饰了”^①。因此,印度人民在摆脱不列颠资产阶级的枷锁之前,是不会收获不列颠在他们中间播下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这说明马克思对军事征服为先导的强迫式的文明同化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发表二十多年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暴力论》中也有与马克思观点一致的论断且内容更加详细。“野蛮的征服者”在用暴力摧毁被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7、768、772页。

征服民族的“大批的生产力”之后,往往“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而被同化,“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①。恩格斯认为,在侵入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无论居于统治地位的入侵者武力多么强大,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都是经济水平(或者说文明)先进的一方:即使拥有“英勇军队”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也不能把落后的“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和其他浪漫的狂念,灌输到本国的铁路、蒸汽机以及刚刚开始发展的大工业中去”。此外,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批判了暴力征服对经济和生产力的破坏作用;然而同时指出,暴力并非“绝对的坏事”,它客观上还具有促进社会进步的“革命的作用”,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马克思、恩格斯概括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社会的进步根本上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文明和文化的影响力远比军事征服强大,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军事征服的野蛮破坏作用应当受到谴责,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在客观上也能够促使落后民族迅速吸收先进文明。

二、马克思命题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的运用

尽管马克思提出的有关“军事上的征服者与文化上的被同化者”这一“永恒的历史规律”并非是针对中国历史提出来的,但它同样也符合中国的历史的实际。作为这一论断的适用对象,首先要包含两个民族或族群,即“征服者”和“所征服的臣民”,并且“征服者”是武力强大的“野蛮的征服者”,而“臣民”则拥有“较高文明”;其次,两者的最终关系是“野蛮的征服者”反而被“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两个层面来探讨马克思的命题在中国历史实际中的适用性。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作为中华民族主干的汉族的前身华夏族便是在中原地区产生,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发展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同时广泛吸收周边民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成败经验,总结同少数民族打交道的策略心得,始终保持先进的文明。其他周边民族则在与中原文化的对峙中处于下风或者臣服的地位。

中国的周边少数民族特别是北方的游牧、游猎民族,因为以畜牧、狩猎为生,成年男子几乎都是天生的战士,自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与中原文明的对峙中多次担任了“野蛮的入侵者”角色,如建立北魏的鲜卑族,建立辽朝的契丹族,建立元朝的蒙古族等。这些“野蛮的入侵者”都建立政权并统治过中国北方或者全境,其军事力量的强大不言而喻。至于拥有“较高文明”的“臣民”角色,则主要由居住于中原地区的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共同体充任。中国历史中至少在五胡十六国时期、辽金元时期和清代是符合“野蛮的入侵者”与拥有“较高文明”的“臣民”之间发生冲突这种描述的。

游牧、游猎民族军事力量的强大很容易理解,而要理解中原文明的先进性,则必须了解中原汉文化。到了新石器晚期,以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先后战胜了西方以炎帝为首的部落集团和东方以蚩尤为首的部落集团进而在中原地区形成华夏部落集团,三族融合构成了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6页。

夏民族的最基本的部分。华夏族基本形成后,历经夏、商、周三代的锤炼,最终走向成熟;又历经春秋时期的争霸战和战国时期的兼并战,通过华夏族和中原周边各族的经济往来、军事攻伐以及人口流动和重组,经过动荡中痛苦的思辨和百家争鸣,最终在秦汉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下发展成为汉族。中原汉文化正是伴随着汉族发展而来,最终在秦汉时期“天下为一,万里同风”^①的大一统文化格局下基本形成。

中原汉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和包容同化的心胸,突出地表现为儒家思想中开明的夷夏观。先秦时期,中原诸夏一直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并自居于文化上的中心地位,已经形成以中原文化为文化正统的认识,“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②。应该强调的是,中原诸夏并不是狭隘地满足于这种优越感,他们也愿意与“夷狄”共享先进的文化,故从春秋时代开始有“用夏变夷”之说。随着中原诸夏与周边民族交流的加强,最终形成两种影响深远的观点。一种强调“华夷之辩”、“严夷夏之大防”,甚至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另一种则认为“夷”、“夏”可以互变,二者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孔子赞同后一种观点,如《论语·八佾》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说,(有时候)“诸夏”还不如“夷狄”那样遵守君臣之礼。孔子的开明观点被儒家今文公羊学派所继承和发扬,由战国末年口耳相传的《春秋公羊传》到西汉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再到东汉末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形成一套从文化上,而不从种族上区分“夷”“夏”的思想学说。这种进步观点,不仅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也是国家统一、各民族间关系大大加强的时代精神的产物。儒家主张的夷夏观是中原汉文化的精华之一,对于促进民族间的友好交流和共同进步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其影响直到近代。

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社会中民族间差异性的分析可知,在某些历史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凭借强大的军队成为“野蛮入侵者”,拥有基于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和汉文化的中原民族则相应成为马克思论断中的拥有“较高文明”的“臣民”。至于两者冲突的结果——军事上的征服者变成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的史实例证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在这里以辽、金两朝作为典型的例证。辽、金两朝政权分别由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和女真族所建立,依靠强大的武力先后占领并统治中国北方地区,治下从事农耕生产的汉族人口占很大比例。为了维护其统治,两朝统治者都主动学习和吸收中原汉文化。首先,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两朝都自视为中国正统。辽人自我定位为“中国”生动地反映了民族融合的过程:一开始只是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接着把宋与自己并称为“南北朝”,最后发展到明确地自称“正统”而将宋朝列入“非正统”之闰位^③。金人占据中原后也援引“中原即中国”、“懂礼即中国”等汉儒学说自称“中国”,但并未将辽、宋排除在“中国”之外^④。此外,辽人甚至认为本民族源于炎帝:“辽之先,出自炎帝”^⑤,尽管并不准确。

其次,两朝都实行“因俗而治”,继承中原的政治制度并大量启用汉族知识分子。辽太

① 班固:《汉书》卷64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18页。

② 《礼记正义·中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4页。

③ 赵永春:《试论辽人的“中国”观》,《文史哲》2010年第3期,第78页。

④ 赵永春:《试论金人的“中国”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第1页。

⑤ 脱脱等:《辽史》卷2《太祖本纪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页。

祖阿保机专门设立“汉儿司”,任命俘获的汉人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实行蕃汉分治。阿保机还按照汉人习俗,广置田宅,修建城郭,“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①。辽太宗时开始实行双轨制:“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②双轨制官制最直接的表现是大量任用汉族知识分子参与军国政事,如韩知古、康默记、韩延徽等。韩延徽原为幽州刘氏政权的使者,被阿保机扣留而成为他的心腹之臣。《契丹国志》赞曰:“方延徽屈身牧圉,微述律后一言,终其身夕阳牛背间耳。城郭宫室,谁其画之?威服诸番,谁其翼之?太祖之兴,延徽有力焉”^③。金代统治者也沿用中原典章制度,代表金朝律令统一和完善的《泰和律义》就大多参照唐律。金朝也大量吸收汉儒参政,特别是从熙宗朝起,大批优秀的汉族官员被选拔出来担任中央机构中的各种高级官吏。台湾学者陶晋生所作的“金代统治阶层种族分配表”,统计了金朝统治阶层中各民族的比例,其中汉人多达40.1%^④。

第三,两朝都崇尚儒学,接受儒家思想。建政之初阿保机就采纳太子耶律倍“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的建议,“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⑤。这一决策意味着辽王朝主动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此后太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基本遵循这一治国原则。辽太祖时修孔庙,置国子监以笼络汉族士人;辽太宗时在南京设“太学”;辽景宗时“诏南京复礼部贡院”准备实行科举;辽圣宗时“用唐之制”正式开科取士。史载辽圣宗汉学修养颇高,“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律吕音声,特所精彻……又喜吟诗,出题诏宰相已下赋诗,诗成进御,一一读之,优者赐金带。又御制曲百余首”^⑥。辽圣宗常以儒家的政治学说为指导思想,“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召番臣(即契丹大臣)等读之”^⑦。金代统治者在占据中原之前已经仰慕中原文化。阿骨打之子完颜宗尧崇敬孔子,天会七年(1129年)引金兵入曲阜后,命知县“引诣圣庙”,“登杏坛,望殿火奠拜”^⑧。金熙宗曾说过:“孔子虽无位,以其道可尊,使万世高仰如此”^⑨。熙宗在京师建孔庙,并由皇帝敕命、政府拨款来修复曲阜孔庙。“熙宗即位,兴制度礼乐,立孔子庙于上京”^⑩。随即又于天眷三年(1140年)秋“以孔子四十九代孙(孔)璠袭封衍圣公”^⑪,并于次年(皇统元年,1141年)二月“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⑫。此后海陵、章宗等也都曾修复各地孔庙。金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得力于金朝统治者对儒学的大力提倡,宗室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素养较高的群体。金朝太祖

① 脱脱等:《辽史》卷74《韩延徽传》,第1231页。

② 脱脱等:《辽史》卷45《百官志一》,第685页。

③ 叶隆礼撰,贾敬颜等点校:《契丹国志》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页。

④ 陶晋生:《金代的政治结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4分(1969年),第583页。

⑤ 脱脱等:《辽史》卷71《宗室·义宗倍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09页。

⑥ 叶隆礼撰,贾敬颜等点校:《契丹国志》卷7,第72页。

⑦ 叶隆礼撰,贾敬颜等点校:《契丹国志》卷7,第71页。

⑧ 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卷3,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年版。

⑨ 脱脱等:《金史》卷35《礼志八》,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15页。

⑩ 脱脱等:《金史》卷105《孔璠传》,第2311页。

⑪ 脱脱等:《金史》卷4《熙宗本纪》,第76页。

⑫ 脱脱等:《金史》卷4《熙宗本纪》,第76页。

“已留心于文事”^①，“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②，还重用原辽宋文人，使“金之文治日以盛”^③。金熙宗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宛然一汉户少年子”^④，“通识汉语，尝授读于韩昉，知诗文，宗室大臣目为汉儿，亶亦鄙宗室大臣若异类”^⑤。海陵王、章宗、世宗等也都以身示范，大力提倡儒学。

由于辽金两朝的统治者能够主动学习和吸收中原汉文化，采取比较包容的“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使得他们在中原的统治能够长达百余年。当然，期间他们也都采取过一些野蛮政策，如金朝曾多次强制进行民族大迁徙。天会五年（1127年）攻破开封后掠“华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⑥。后又“虑中国怀二三之心”^⑦，在灭亡北宋后几次大规模地把女真人从东北迁到中原各地以监视汉人。这些民族迁徙活动对当地的经济生产有很大破坏作用，但是客观上也因为造成女真、汉族以及其他各民族交错杂居而促进了先进文明的传播和民族融合。

同样作为北方少数民族和中原地区的征服者，与辽、金对中原汉文化的主动学习和吸收不同，元朝则是采取了比较消极、被动的态度。辽金两朝的统治者在建立政权之前就已经仰慕中原汉文化，因此入主中原后很快就主动实行汉化。蒙古族凭着强大的骑兵先后征服了金、西夏、南宋乃至西亚和部分欧洲国家，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疆域最大的王朝。强大的武力帮助他们夺取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权，却无法将他们的经济生产方式也强加给中原地区。在建立元朝之初，蒙古人的部分首领曾有将中原变为牧场的打算，但是最终只能以失败收场。元朝统治者逐步认识到自身文明的落后，为了巩固统治，不得不在保留中原地区的官僚制度的同时，改革本民族的制度，从奴隶制向领主制全面转化，建立以蒙古族的贵族领主制来统御汉人及其他民族的官僚制。为此他们不得不接受中原文化，将儒学立为道统。

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阐述的历史发展趋势，蒙古族也一样地先以野蛮的征服阻碍了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后在长期的征服中却不得不适应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元朝统治者的被动态度还反映在他们实行阶级压迫的高压政策上。元朝把治下百姓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阶级矛盾尖锐。虽有强大的军队，但元朝的统治却不超过百年，不能不说与统治者对待中原汉文化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反观之后同样靠强大的骑兵建立大一统帝国的清朝（同为女真族建立），对待中原汉文化的态度则是大力学习和仿效，结果出现过康乾盛世那样的局面，其统治延续了两百多年。此外，对于元朝靠军事征服造成的大一统局面，也应该辩证地看待。蒙古早期和元初造成的破坏，“毕竟是在一定时间内局部地区所发生的现象，就整个中国或蒙古民族本身来考察，元代的社会生产力不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8《金代文物远胜辽元》，中国书店1987年版，第389页。

② 脱脱等：《金史》卷125《文艺传上》，第2713页。

③ 脱脱等：《金史》卷105《传赞》，第2324页。

④ 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注：《大金国志校证》卷12《熙宗孝成皇帝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9页。

⑤ 确庵，耐庵编，崔文印笺证：《靖康稗史七种》之呻吟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5页。

⑥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辛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2页。

⑦ 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注：《大金国志校证》卷36《屯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0页。

是停滞不前,而是向前发展的”^①。战争中的野蛮杀戮是应该谴责的,但是统一的政治局面又有利于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有利于社会向前发展。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记述了132位受中华文化影响而华化的西域色目人,这是国家统一对文化传播有促进作用的例证。

三、马克思命题的启示

马克思关于“军事上的征服者与文化上的被同化者”的重要命题对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的关系有重大指导意义。但必须注意的是,与马克思提到的印度民族与阿拉伯、不列颠等的关系是本民族与外族的关系不同,中国境内各民族自古毗邻而居,往来关系密切,中国古代的中原民族与周边民族是兄弟民族的关系。这种兄弟民族关系,突出地反映在中原文化“大一统”的政治观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文化观上。早在汉代,司马迁在其不朽的通史巨著《史记》中就非常重视记载周边民族的活动,甚至认为他们与中原民族同源:“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②，“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③。司马迁分别撰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以具体的史实证明周边民族与中原民族关系的紧密,对于促进全国各民族的统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军事上的征服者与文化上的被同化者”这一命题符合中国历史实际,近代史学家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曾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军事上先进的游牧民族往往从“政治上之征服者,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④。在民族融合的相关问题上,梁氏有很多开创性贡献。首先,他提出界定民族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民族意识”(即历史文化认同心理)。其次,他论证了中华民族“多元结合”、“诸夏一体”,经历数千年而形成复杂且稳固的民族共同体。他还认识到了中华民族多民族统一、融合的历史趋势,指出汉族本身就是靠融合其他民族“混血”而成。最后,他揭示出了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深层原因:共同的地域,共同的文字,以及趋向统一、爱好和平兼容并包的民族性格等。此外,梁氏还概括了多种民族融合的方式。

建国后,翁独健、白寿彝、谭其骧等学者在1981年的研讨会上提出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各民族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共同推动了祖国历史的前进”这一重要观点。相关理论成果还包括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和费孝通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⑤。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白寿彝对处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创见,这在《中国通史纲要》里有专门论述,陈其泰先生将其归纳为以下四点:一、应平等地把国内各民族共同地视为祖国历史的创造者,各兄弟民族的历史贡献都应该得到重视;二、应把民族杂居的封建化进程

① 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4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

③ 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④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第8册,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62页。

⑤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作为划分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主要标准之一;三、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四、应正确评价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的历史地位^①。总的来说,白寿彝主张要把对历史问题的具体分析、恰当论断,和加强今天的民族团结的著述目的结合起来。

近代梁启超的观点,以及建国后费孝通、白寿彝等学者的理论成果,对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民族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再进一步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非常有助于我们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特点,有助于加强对多民族统一和融合趋势的认识。梁氏曾将民族融合方式概括为四种:其一,寇暴内地,留而不归,后遂散为齐民;其二,华人投入其族,抚有其众,因率以内附;其三,略责为奴婢,渐滋殖成编氓;其四,历代用兵征服,强迫同化。笔者认为,梁启超的概括过于注重具体过程。若遵循《中国通史纲要》提出的几条原则并从马克思命题的视角出发,站在加强今天各族人民团结的立场上来看,则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就是各兄弟民族在各种形式的接触(经济往来、文化交流以及军事征服)中淘汰落后生产生活方式、学习先进文明的过程;或是在中原民族军事力量强大或与周边民族力量相当的和平时期,少数民族向往中原文明,徙迁内地与汉民族杂居,接受先进的汉文化,最终融于汉族(隋唐时期);或是在少数民族军事力量强大并以武力征服中原后,为了稳固统治和长治久安,统治者或主动(北魏、辽、金、清)或被动(元代)继承中原的典章制度和文化的等。当然,这里主要是针对大规模的民族融合而言,因此最终都是朝着中原先进文化决定的方向发展;不排除在某些时期的特定地区,也发生过原属中原民族的民众进入周边地区然后被当地民族同化的现象。另外要强调的是,由于中原的富庶以及中原文化包容的特点,即使是在拥有强大军队时,中原政权也很少会采用武力胁迫的方式“用夏变夷”,类似不列颠推动印度进步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很少见。

由于中国相对独立隔绝的地理格局,古代民族的活动被局限在中华大地上,多民族统一和民族融合是众民族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马克思命题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出了,相互接触的各民族中无论哪一方的武力强大,最终决定民族融合方向的都是拥有先进文明的一方。但是,这并不是说军事征服的作用可以忽略。学者们历来对这一问题非常重视,如翦伯赞认为民族融合通过杀戮等实现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在向着融合的方向发展;而吕振羽则认为民族间的融合不可能在阶级社会中实现,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民族间没有界限的融为一体^②。笔者认为,应借鉴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首先,民族间的军事冲突当然应该受到谴责,然而在阶级社会中又往往不可避免。回顾中华民族走过的曲折多艰的道路,我们更应该珍惜今天各民族友好团结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军事征服也有客观的积极意义。它用暴力促成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统一,而统一的政治环境对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是非常有利的。元朝靠野蛮杀戮统一中国,它的建立也大大加速了边疆地区的封建化

① 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陈其泰:《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处理》,《回族研究》2005年第2期,第104页。

② 翦伯赞:《关于正确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翦伯赞历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页;吕振羽:《关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问题》,《史论集》,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182页。

进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正如恩格斯所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有些时候,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比如中原的明朝和东北的满洲、北方的蒙古,时而兵戎相见,时而通过和谈商议和互市。蒙古瓦剌部与明朝发生的“土木之变”,其直接导火索就是因为明朝没有满足蒙古方面通贡互市的要求。俺答汗发动“庚戌之变”的目的也是以战求和,以武力威逼明朝进行互市。虽然,战争促进了经济的往来交流,但是我们并不提倡靠这种方式实现统一、融合。总之,在中国古代中原政权和周边民族政权的交往中,无论是战是和,最终结果都是加强了经济文化往来,走向民族融合。

多民族统一和融合是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和必然趋势。长远来看,军事征服的历史作用是短暂的,先进文明的影响才是根本的和久远的,是国家兴盛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封建社会出现过一些“盛世”,根本上并非因为军队的强大,而是因为拥有先进的中原文化。唐太宗被少数民族拥戴为“天可汗”,主要是因为他对少数民族采取“抚有四夷”、欢迎归附的开明政策。唐太宗说:“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四夷可使为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他还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①正是这种开明的夷夏观,促成了国家繁荣安定,各族人民团结友好的盛世局面的出现。

重视文明教化而轻军事征服,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和固有基因。《论语·季氏》篇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尚书·大禹谟》中记载,舜命大禹去征讨不听命的苗民时,益告诫大禹说:“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左传》中子鱼提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②。从这些记载可知,中华传统观念与马克思阐发的历史规律一致,认为武力只能作为一种威慑手段,真正征服对方还是要靠文明和文化。在经过近代共同的反压迫、反侵略斗争建立的新中国里,各族人民更要珍惜当前团结友好、密不可分的大好局面。我们要重视大力发展文化来增进各民族间的关系,用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来增强民族认同感。

(作者李玉君,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邮编:116081)

(责任编辑:吴英)

(责任校对:张文涛)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8,唐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条,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247页。

② 洪亮吉撰,李解民点校:《春秋左传诂》卷7,僖公十九年,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3页。